

皈依的基督徒

——論李提摩太對《西遊記》作者身份的重塑

A Converted Christian: On the Re-molding of
the Author in Timothy Richard'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ey to the West)

王文強 孫雁冰

WANG Wenqiang SUN Yanbing

作者簡介

王文強，安徽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

孫雁冰，台州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Wenqiang,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Email: wangwenqiangkaka@126.com

SUN Yanbing,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Email: sunyanbing06@163.com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Masterpieces” among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Xiyouji*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has long been popular among Chinese readers. It has also been widely translated, and these translations have provided a rich resourc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first English monograph of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13, namely Timothy Richard’s *A Mission to Heaven*. In this translation, Richard is convinced of Qiu Chuji’s authorship of the novel. In Richard’s interpretation, Qiu, a Daoist priest, is ultimately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the convert Qiu even becomes a spokesman for Richard’s “Religious Liberty”. By altering Qiu’s birth date, Richard manages to identify the capable Qiu with with wise emperor Kubla Khan, bringing them together in a cause that reflects Richard’s own political ambition.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Qiu Chuji; Remolding; Timothy Richard

一、引言

1913年，上海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推出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西遊記》英譯本《天國之行：一部偉大的中國史詩和寓言》（*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在此之前，《西遊記》的“英文翻譯是片段式的”^①。儘管李氏的《西遊記》譯本也只是“《西遊記》的一個輪廓”^②，但畢竟是首次以譯本的形式向英語世界的讀者展示這部小說，其開創之功不可磨滅。更值得關注的是，李氏將《西遊記》視作一部蘊含基督教色彩的小說：“1913年，我翻譯的中國文學名著《西遊記》以《天國之行》的名義發行。就我看來，這部作品很明顯有著深厚的基督教哲學思想……我心裏絲毫不懷疑，這是一位基督徒旨在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作品^③。”目前，學界已有多篇文章探討了李氏對原著的“基督式”改造，其中黎子鵬的文章較有代表性，該文細緻考察了李提摩太對《西遊記》中佛教元素的基督教解讀，展示了譯者在20世紀早期為推進“佛耶對話”以及宗教比較研究所做的努力^④。

^① 胡淳艷：《〈西遊記〉傳播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29頁。[HU Chunyan, *Xiyouji chuan bo yan jiu* (Beijing: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3), 229.]

^②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5), 276.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343-344.

^④ 黎子鵬：《翻譯佛教——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基督教詮釋》，顧靜琴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2015年第1期，第55-78頁。[LAI Tsz Pang John, “Translating Buddhism: Timothy Richard’s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 GU Jingq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1(2015):55-78.]

此外，胡淳艷^①、于懷瑾^②、劉珍珍^③、吳曉芳^④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譯者基督教文化身份對譯本（包括主題、人物形象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這些學術成果為推動《西遊記》在海外的傳播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遺憾的是，除于懷瑾老師以外，譯者在序言中對原著作者身份的長篇闡釋似乎未能引起學界的關注，但是于懷瑾論文中的一些具體細節和史實需繼續考證和研究。

李氏開宗明義，認為作者丘處機實際上是皈依的基督徒，那麼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他是如何讓原本道教徒身份的丘處機皈依基督教的？譯者如此執著於改造丘處機宗教身份，其原因何在？其次，根據《元史》的記載，丘處機曾為成吉思汗出謀劃策，深受其器重。然而，李氏在譯本中將成吉思汗替換為與丘處機並無關係的忽必烈，為此甚至不惜篡改丘處機的生卒年份，那麼這又折射出李氏何種心理？本文將力圖解答這兩個問題。

二、李提摩太眼中的《西遊記》作者

關於《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歷來是學界爭論的焦點。現存《西遊記》的最早版本為金陵唐氏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

^① 胡淳艷：《〈西遊記〉傳播研究》，第240-243頁。

^② 于懷瑾：從《〈西遊記〉的翻譯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62-70頁。[YU Huaijin, "From Xi You Ji to A Mission to Heaven: A Review on Timothy Richard's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14):62-70.]

^③ 劉珍珍：《〈西遊記〉節譯本的敘事建構策略研究》，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31-36頁。[LIU Zhenzhen, "O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e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2017):31-36.]

^④ 吳曉芳：《圖文互證：李提摩太〈西遊記〉英譯本的底本考論》，載《編譯叢刊》，2019年第2期，第1-44頁。[WU Xiaofang,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Illustration and Text: On the Source Text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no. 2(2019):1-44.]

記》，即通行的百回本《西遊記》，署名為“華陽洞天主人校”。在明代文人陳元之所作的《刊西遊記序》中，他也指出“《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①。由於未署名，要確定小說真正作者有很大的困難。康熙二年（1663年），著名學者黃周星與書商汪象旭合作，對明百回本《西遊記》在文字上潤飾修改，並更名為《新鐫全像古本西遊證道書》（《西遊證道書》），並在卷首另附元朝虞集所寫的《西遊證道書原序》以及《丘長春真君傳》，首次提出小說的作者為“國初丘長春”（即丘處機）的說法。此後，“丘作論”的觀點被《西遊真詮》《西遊原旨》《通易西遊正旨》《西遊記記》《西遊記評註》等清代點評本所接納。可以說，《西遊記》為丘處機所著的說法在有清一代佔據著主流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主流說法以外，也存在著些許質疑丘處機著作權的學者。其中，晚清著名學者王韜便是代表人物之一。1888年，上海味潛齋重印張書紳點評的《新說西遊記》，更名為《新說西遊記圖像》發行，該書曾風靡一時，“此書一出，宜乎不脛而走，洛陽為之紙貴”^②。在由王韜所作的序言中，他首次在《西遊記》點評本序言中公開質疑“丘作論”的觀點。“或疑《西遊記》為丘處機真人所作，此實非也。元太祖駐兵印度，真人往謁之，於行帳記其所經，書與同名，而實則大相逕庭。以蒲留仙^③之淹博，尚且誤二為一，況其他乎？因序《西遊記真詮》而為辯之如此^④。”作為晚清時期有著

^① 吳承恩：《西遊記》（世德堂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頁。[WU Cheng-en, *Xiyouji* (Shi Detang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ress, 2016), 1.]

^② 朱一玄、劉毓忱：《〈西遊記〉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65頁。[ZHU Yixuan, LIU Yuchen, *A Reference Collection of Xiyouji*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365.]

^③ 蒲留仙即是清代著名文學家蒲松齡，他在《聊齋志異》中的《齊天大聖》這篇故事裏寫道，“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丘翁即是丘處機。很明顯，蒲松齡將丘處機視為《西遊記》的作者。見蒲松齡：《聊齋志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第1494頁。[PU Songl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1494.]

^④ 朱一玄、劉毓忱，《〈西遊記〉資料匯編》，第365-366頁。

較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李提摩太和王韜曾有過較多的接觸和交流。在前者接掌廣學會後，採用舉辦徵文活動這種頗有新意的方法，以此達到推廣社會教育的目的。評判會則設在中西書院內，評審團由王韜、沈毓桂、蔡爾康組成^①。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翻譯《西遊記》之前，李氏有可能也懷疑過《西遊記》並非由丘處機所作。然而，在1913年出版的這個譯本中，李氏對“丘作論”的觀點卻是深信不疑。在其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中李氏曾提到：“1913年8月，我正在翻譯中國著名傳說和寓言故事《西遊記》，那時我十分渴望去看看這位小說作者——一位著名道士曾居住過的地方。”^②為此，李提摩太“踏著崎嶇不平、布滿礫石的道路，到達了太清宮（同上）”。在1913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他的《西遊記》譯本時，李提摩太特意將拍攝的太清宮照片附在譯本中，並指出“丘長春正是在嶗山開啟了自己的傳教生涯”^③。除此之外，李提摩太在譯本扉頁、序言中可謂是全方面地介紹並改造了丘處機。

三、從道教徒到基督徒 ——李提摩太對丘處機宗教身份的改造

李提摩太在扉頁介紹上將丘處機描述為“原本為道教的伽瑪列，後成為景教的先知和中國朝廷的顧問，生卒年為1208-1288，比但丁出生早67年”。那麼誰是伽瑪列？李氏為何又拿伽瑪列與丘處機作類比？

^① 見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頁。[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164.]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356.

^③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3), 363.

根據《新約聖經》記載，伽瑪列為猶太公會德高望重的律法教師，使徒保羅是他的學生之一（徒5:34；22:3）^①。彼得和使徒們在耶路撒冷聖殿教導以色列人並宣告：“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徒5:28-31）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想要殺了他們。就在千鈞一發的關鍵時刻，伽瑪列站起來勸說公會大祭司們小心處理這些人，並舉例說明：“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徒5:40）這些猶太人聽從伽瑪列的勸誡，沒有殺害使徒，只是將他們打了一頓，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義講道，然後將他們釋放。無疑，伽瑪列在關鍵時刻救了使徒們的性命。李氏在《西遊記》英譯本序言中對伽瑪列與丘處機二者關係做了如下闡釋：“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把本書作者（按：丘長春）當作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道教聖人，在創作這部小說時，他一定像保羅一樣已經皈依了基督教，那時他不再是伽瑪列的門徒，而是皈依基督教的伽瑪列本人^②。”保羅，本名“掃羅”（Saul），他是早期基督教最具有影響力的傳教士之一。根據《使徒行傳》記載，保羅是一名嚴厲的法利賽人，曾激烈反對基督教並參與迫害基督徒的行動。後來在大馬士革得到耶穌啟示，便轉而信奉基督教，之後為基督教在世界的傳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徒9：1-19、31；22：1-22，31；26：9-24，31）但《新約聖經》中找不到任何透露保羅老師伽瑪列最終皈依基督教的信息。那麼，李氏是如何在譯本中一步步將丘處機由道教徒改造為基督徒的？

在中國歷史上，道教曾多次參與打擊佛教的活動。其中，“三武法難”可以稱之為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在李氏看來，身為道教徒的丘處機並沒有藉創作《西遊記》時攻擊佛教，而是在晚年時改信了大乘佛

^① 中國基督教協會：《聖經》（和合本），上海：中國基督教協會，2009年。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The Holy Bible*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Press, 2009).]

^②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viii.

教，“所有的中國人都將丘處機視為道教教徒，然而令人詫異的是，他居然為大乘佛教做了絕佳的辯護”^①。李氏此處所提的“辯護說”與他對這部小說主題思想的解讀相呼應：“《西遊記》不是一部講述比較宗教學的著作，然而它卻包含著許多偉大宗教的思想，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大乘佛教旨在將世人從邪惡和苦難中拯救出來，並超脫那些迷失在地獄中的靈魂。這部小說記錄了虔誠信奉大乘佛教的主人公所經歷的變化。”^② 早在山東青州傳教時期，李提摩太就已經開始研習與中國宗教相關的書籍。1884年左右，在閱讀完《大乘起信論》之後，李提摩太有關中國佛教的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並宣稱：“這是一部蘊含基督教教義的作品！儘管所用的術語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卻是基督教的”^③。此後，他特別重視對大乘佛教經典作品的翻譯，如《大乘起信論》和《大乘佛教新約》等作品。李提摩太在《大乘佛教新約》序言中曾暗示大乘佛教實際上是基督教在亞洲的“變形”形式，“大乘佛教由馬鳴創立，而非釋迦牟尼。這個佛教教派創立於基督教時代的公元1世紀左右，這時候東西方交流非常頻繁。”^④ 之後的1916年，李氏將這個觀點直接寫進了《李提摩太致世界釋家書》（*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之中：“多馬與約翰同傳道於亞細亞，使變更釋教，其道遂亦遍佈亞洲。”^⑤ 然而，在“改造”丘處機時，李氏並沒有直接將作者晚年信仰的大乘佛教等同於基督教，而是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借用了景教這條連接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的“橋樑”。

“景教”即唐代傳入中國的聶斯脫里教（Nestorianism），該教派起源於敘利亞，屬於基督教教派，但是由於反對將聖母瑪利亞作為神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xxii.

^② Ibid., viii.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195.

^④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London: T. & T. Clark, 1910), 2.

^⑤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24.

靈膜拜，被基督教斥之為“異端”。唐太宗貞觀九年（635），以阿羅本為首的一批景教信徒經皇帝下詔同意後在長安傳播景教。公元638年，“景教乃為唐朝公認，以國費建大秦寺，置僧21人，這就是景教流行中國的開始”^①。景教在李提摩太改造丘處機宗教身份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序言的第14部分，譯者特意撰寫了《重新發現的景教文獻》^②（*Lost Nestorianism Rediscovered*）一文，宣稱譯者在《西遊記》中找到的驚人發現，“儘管我們沒有討論大乘佛教的起源問題，但是毫無疑問，這個問題在小說第88回^③給我們做了解答，這些朝聖者因受上天啟示而皈依的大乘佛教實際上和景教是一樣的，因此，他們皈依的其實就是基督教”^④。也就是說，在李提摩太看來，大乘佛教、景教與基督教在本質上是等同的。既然“晚年的丘處機以大乘佛教的形式

^①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頁。[ZHU Qianzhi, *Nestorianism in China*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8), 73.]

^② 李氏所指的“景教文獻”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於唐建中二年（781），碑文由波斯傳教士景淨撰刻，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明代天啟帝三年（1623）被發掘，現藏於西安碑林。

^③ 李氏指出：“儘管這部小說的主要目標在於弘揚大乘佛教，但是他還包含了儒教、道家以及第88回中的景教教義。”見：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viii. 那麼，李氏所提的小說第88回的景教教義到底是甚麼？小說第八十八回講述師徒一行來到臨近天竺的玉華州，唐僧的三位徒弟傳授三位小王子法術的故事。起初，三位小王子對他們頗為不敬。於是，悟空三人便將自己的法術展示了一番。緊接著，作者用一首韻文描繪了上述情形：真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李提摩太的譯文如下：The 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 is not human, The Great Way, whose origin is in all space, Whose influence pervades the Universe, Has balm to heal all suffering. 見：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309. 譯完這首詩後，李氏不忘在“true Illustrious Religion”下面注明信息：“此處所用的漢語名字與景教碑上指稱基督徒所信教名相同。”其中，譯者所指的“景教碑”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運用許多中國宗教經典闡釋景教教義，所謂“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見：朱謙之：《中國景教》，第47頁。作者此處借用這首韻文的目的是於讚揚悟空三人的高超武藝，而原詩中的“景象”是指“現象”之意，與“景教”沒有任何關係，李氏很明顯是牽強附會。然而，在李氏的闡釋下，譯本中就出現了“景教”。

^④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xxii

皈依了景教”^①，那麼他無疑也就是基督教的成員之一。在李提摩太的“操縱”下，《西遊記》的作者丘長春終於皈依基督，這就為譯者繼續改造《西遊記》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也就是說，既然小說作者最終皈依了基督教，那麼這部作品很可能會折射出某些“基督色彩”，這就為李氏“援佛入耶”的闡釋手段創造了條件。

四、借古喻今 ——李提摩太對“宗教自由”觀念的闡釋

之所以將丘處機等同於伽瑪列，我們認為，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譯者“宗教自由”的理念。在彼得和眾使徒四處傳播基督教時，該教義在當時不僅不受認可，而且教徒們也是經常遭到迫害。作為猶太教權威的伽瑪列在關鍵時刻保護了他們，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他的行為確實值得欽佩。在李氏看來，伽瑪列對這些教徒的保護行為就有了“宗教自由”的影子。實際上，作為基督教傳教士，“宗教自由”一直是李氏所追求的理想。自近代基督教進入中國，西方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行保障基督教在華特權，這在很大程度上讓中國人民對基督教傳教士心存牴觸，民間教案因此多次發生（青浦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直至釀成聲勢浩大的“義和團運動”。面對這種情形，李氏身體力行，以自己所辦的報刊為媒介，“大量登載對傳教士有利的聲明，並且強調傳教士在幫助中國賑災和醫藥援助方面所做的種種貢獻”^②。1908年，李提摩太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見面，伊藤相信“一個民族，如果反對宗教自由，勢必導致不同宗教之間的持久論爭……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其他宗教的信奉者們也會效忠於政府，就會在從事有益於社會的事務上相互競爭，從而從各個方面壯大國家的力量。”^③李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xxii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242.

^③ *Ibid.*, 345.

氏十分認可伊藤所言，甚至將伊藤博文的“宗教自由”的觀點寫進他的《西遊記》英譯本序言中：“無論何種宗教，如果它們聲稱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完美無缺的，就採取暴政的方式摧毀其他所有宗教，這樣的行為令人無法忍受……宗教對話的基本原則是承認沒有任何宗教能獨霸真理，無論何種宗教，只要其教義的精華部分是神聖永恆的，那麼這些教義應該得到所有人的尊重。”^①

在李氏看來，伊藤博文“宗教自由”的觀念與丘處機如出一轍：“這部小說的作者心胸並不狹隘，即他不是只稱頌自己所信奉的宗教，而將其他宗教一概視為邪惡派系的那類人。小說作者原本為道教弟子，但在該作品中他同樣描繪了儒教的聖人、佛教徒的佛祖以及天上的道家統治者們。”^② 儘管深受蒙古皇帝的器重，丘處機卻並沒有利用特權去打壓，甚至摧毀其他宗教。在李提摩太的詮釋下，“心胸寬廣”的丘處機不僅讚揚了儒教、道教的聖人，甚至“在小說第100回，作者也稱頌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和印度教的創造之神梵天^③”。讀到這裡，我們不禁心生疑竇。《西遊記》第100回最後部分為唐僧師徒與眾多佛教神仙合掌皈依，口念63個佛教人物的尊稱，李氏對這些名稱做了詳盡的翻譯。如果說綜合婆羅門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教義而形成的印度教與佛教還存在一絲聯繫，但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與佛教菩薩的差異卻是太過明顯。我們發現，譯者將該部分的“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譯成“In Mohammed of the Great Sea”^④。這樣一來，《西遊記》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穆罕默德。實際上，李氏為證明自己言說而“肆意篡改”原著的做法可謂是屢見不鮮。^⑤ 那麼在翻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i-xii.

^② Ibid. viii-ix.

^③ Ibid., viii.

^④ Ibid. 362.

^⑤ 有關李提摩太在譯本中對原著唐僧形象基督式改造的論述，可參見：胡淳艷，《〈西遊記〉傳播研究》，第240-243頁。

譯“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時，他是如何實現“移花接木”的？我們認為，李氏有意將“清淨”（Pure and Clean）改寫為相近的“清真”（Pure and True），而“清真”為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稱號，其創始人正是穆罕默德。在李氏的改寫下，伊斯蘭教也成為丘處機在小說100回所讚揚的宗教之一，其“宗教自由”的理念在譯本中也得以呈現。

五、何以為忽必烈之寵臣？ ——李提摩太對丘處機生平際遇的改寫

為實現言說自我的目的，李氏不惜借用大量篇幅詳細介紹丘處機的生平。有學者認為，“在清代的諸種版本裏，只有《證道書》在體例上‘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長春真君傳》，次《玄奘取經事蹟》’”^①。這與李提摩太的《西遊記》英譯本有關丘處機英文介紹的文字貌似實現了契合，於是該文作者便得出《西遊證道書》是李提摩太《西遊記》譯本底本主要參照本的結論（同上）。細讀兩篇文字，我們便會發現二者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首先，這篇《丘長春真君傳》只是相對簡略地敘述了丘處機的一生，並沒有英譯文中的“勸阻元蒙皇帝屠戮平民、拯救30000漢人”^②這種堪稱英勇行為的記載，他對皇帝的建議充其量為“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③；再者，原文同樣缺少譯文中所提及

^① 李暉：《“永生”的寓喻敘事：淺析李提摩太〈西遊記〉的翻譯理解方案》，載《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年第8期，第31頁。[LI Hui, “An Allegory of Christian Immortality: Timothy Richard’s Scheme of Understand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8(2013):31.]

^② 原文為：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以蘇黔黎，亦祈福之一端耳。見吳承恩：《西遊記》（西遊證道書），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3頁。[WU Cheng-en, *Xiyouji (A Taoist Interpretation of Xiyouj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3.]

^③ 譯文為：After some time Chiu returned to Chihli and sent his disciples by order of the Emperor to release those who had been taken prisoners, so that slaves became freemen again, and those who were at the point of death were delivered. The number of people so released was no less than 30,000. 見：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ix-xi.

的王重陽唯一女弟子孫不二^①。可見，李提摩太譯本中有關丘處機介紹的來源並非《西遊證道書》中的序言部分。實際上，李氏在介紹丘處機的開頭部分，已經點出了它的來源——《欽定元史》。筆者按圖索驥查閱到《欽定元史》於1884年由上海同文書局出版（據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本石印），現將其主要內容摘抄如下：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太祖時方西徵，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②

按照《欽定元史》的記載，丘處機卒於丁亥年（即1227年），“卒年八十”，也就是出生於1148年；上文的“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指的是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侍臣求賢於丘處機之事。然而，閱讀李氏譯文，我們驚奇地發現譯者有意將上述年代增添了一個甲子。於是，李氏在扉頁對丘處機介紹的生卒年變成了“1208-1288，比但丁出生早67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侍臣持詔求之之事也順理成章地更改為“公元1279年，元代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派

^① 譯文為：Chiu went there and received instruction with five others, one of whom was a famous woman, Sun Pu Erh (Ibid., ix)。

^② 1884年同文書局版《欽定元史》並沒有標注頁碼。

遣兩位大臣邀請丘處機入宮謀事”^①。對此，李氏是這樣解釋的，“一些學者認為丘處機的出生年份應該是前一個甲子年（即1148年），這個觀點無疑是錯誤的^②”。至於李氏為何如此相信自己的判斷，他卻沒有給出任何憑據。那麼李氏是否知曉丘處機真正的生卒年份？閱讀序言部分及其它相關資料，我們並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鑒此，我們嘗試給出一個推測。首先，譯者之所以添加上條注釋，說明他已經注意到丘處機生卒年份的問題，不過李氏本人更相信丘處機的生卒為較晚的甲子年（1208-1288）；其次，在解釋忽必烈的插圖時，譯者注明“忽必烈為成吉思汗的孫子”，可見譯者是知曉成吉思汗這位歷史人物的，而《欽定元史·丘處機傳》中多次出現成吉思汗的廟號“太祖”這一稱呼，根據李氏在華四十五年的傳教經歷以及較高的漢學水平，我們有理由相信李氏了解丘處機的生卒年份以及他與成吉思汗的關係，也很清楚忽必烈與丘處機並無來往。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氏將丘處機的出生年份推遲一個甲子，是有意為之。原因在於，唯有推遲丘處機的生卒年份，才能將其與譯者理想的君主忽必烈勾連在一起。歷史上忽必烈於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消滅了南宋最後的殘餘勢力，最終完成了全國的大一統。而李氏在序言中宣稱：“公元1279年，他將這部偉大的作品呈獻給忽必烈大汗。”^③這樣一來，在李氏的“撮合”下，卒於1288年的丘處機便與忽必烈建立起了聯繫。

李氏在譯本中對忽必烈情有獨鐘，在該譯本所附的30幅插圖中，譯者便將這位與《西遊記》原本毫無關係的元代皇帝插圖放置其中。那麼，李氏何以對忽必烈這位皇帝青睞有加，以至於用他來替代成吉思汗？我們認為，譯者的選擇絕非率爾操觚，而是由有著兩個方面的

^① 原文為：In 1279,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Yuen dynasty, Kublai, sent two ministers, Liu Chung Luh and Chebur to invite him to come to the court. 見：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ix。

^② Ibid.

^③ Ibid., xii.

考慮。首先，李氏之所以將原文中的主角皇帝成吉思汗替換為忽必烈，很可能是因為成吉思汗在西方人心中形象不佳的原因造成的。儘管李氏將成吉思汗視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天才”^①，但是有個不爭的事實，即成吉思汗統治期間，他多次發動對外戰爭，禍及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地區，給該地區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其次，在李氏看來，與成吉思汗相較，忽必烈代表著理想的君主形象，他與丘處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本人的政治抱負。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李氏所作的序言中洞見端倪：

與那些古今偉大的印度、希臘和歐洲的作家和科學家相比，該不朽作品的作者丘處機毫不遜色。當蒙元建立者忽必烈從各地招賢納士、以助自己能夠取得震古爍今的成就之時，丘處機被選中為朝廷及其宗教政策出謀劃策……在閱讀完《西遊記》中所闡釋的大乘佛教教義後，蒙元統治者放棄了殘暴不仁的戰爭殺戮政策，取而代之的便是和平與文明時代的到來。^②

在元代皇帝中，忽必烈是為數不多的能為後世所推崇的君主之一。雖說他也曾指揮蒙古軍隊各地徵戰，但是在其統治期間，他努力恢復因戰爭而幾近崩潰的中原經濟，實行較為寬鬆的宗教政策。其中最為世人稱道的，便是他能打破蒙漢界限，推崇儒術治國，並且重用漢族人才。《元史》這樣評價忽必烈：“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③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對其知人善任的特點也是讚賞有加，“及

^①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xii.

^② *Ibid.*, xii—xiii.

^③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77頁。[SONG Lian, *A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6), 377.]

世祖興，始延攬姚樞、竇默、劉秉忠、許衡之徒，以漢法治中夏，變夷為華，立綱陳紀，遂乃並吞東南，中外一統”^①。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忽必烈打破蒙漢界限、樂於招賢納士的評價比較中肯。然而，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已經知曉丘處機與忽必烈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產生互動聯繫，因此丘處機“被選中為朝廷及其宗教政策出謀劃策”可以說是妄談之論。之所以如此，我們認為這與李提摩太的個人際遇有著很大的聯繫。1890年，李提摩太擔任廣學會該會督辦（後改稱總幹事），之後組織編譯出版了大量有關西方政法、史地、實業、理化等方面的書籍，並發行《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女鐸報》等報刊，這些報刊在某種程度上引導了19世紀末的中國改革思潮。康有為“初講學長興里，號長興學舍，好測覽兩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莫不盡量購取”^②。他曾向當時香港《中國郵報》的編輯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③當梁啟超聽聞李提摩太需要一名秘書協助其工作時，“便自告奮勇的表示樂意擔當此任”^④，之後他積極參與“戊戌變法”，通過翁同龢向光緒帝提出了包括“改革貨幣”“興建鐵路”“創辦新式教育”等7項措施，得到了光緒帝的肯定。^⑤1898年，康有為邀請李提摩太擔任光緒帝“維新變法”運動的顧問，然而未及赴任。這次變法圖強的運動在慈禧太後的阻撓下宣佈流產，李提摩太“變革中國”的政治理想也因此化為泡影。我們認為，這對李氏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李氏在

^① 魏源：《元史新編》，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142頁。[WEI Yuan, *A Newly Organized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2), 142.]

^②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頁。[FENG Ziyou, Yuan, *The First Collection on the Unofficial History about Revolution*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1), 47.]

^③ 魯珍晞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9頁。[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trans. ZENG Jusheng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 39.]

^④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255.

^⑤ *Ibid.*, 256.

翻譯《西遊記》時，曾多次在譯本前言中強調丘處機皇帝顧問的身份，可以說對丘處機深受皇帝信賴的人生經歷十分羨慕，丘處機和忽必烈君臣一心、共拓大業正是李氏政治理想的表達。遺憾的是，雖說光緒帝十分認可李氏的改革主張，但是由於大權旁落，還沒來及將這些改革措施付諸實施，就被慈禧太后軟禁瀛台，就此淒涼地渡過了餘生。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藉助他們的君臣關係，“澆胸中之塊壘”。需要指出的是，李氏並未因此打擊而灰心喪志。他積極參與“義和團運動”的善後工作，“在清廷與列強之間穿針引綫，發揮了任何朝廷大臣都無法替代的作用”^①。1902年，李氏用“山西教案”的賠款在太原創辦了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它是中國最早的三所國立大學堂之一，與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一道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新紀元。儘管“戊戌變法”並沒有成功，但是李氏仍舊為開啟國人民智、推進中國社會變革“做出了誰也沒法抹煞的貢獻”^②，這一點值得我們銘記。

結語

受到譯者文化身份與具體歷史語境的影響，李提摩太對他眼中的《西遊記》作者丘處機進行了改造。首先，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傳教士，李氏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首先將丘處機從最初的道教徒改造為“大乘佛教的辯護者”，繼而借用景教這條連通大乘佛教與基督教的橋樑，使丘處機最終皈依基督。之後，李氏對譯文的相關內容進行改寫，使丘處機成為其“宗教自由”理念的代言人，這與李氏的傳教訴求相

^① 李憲堂：《鐸巡中華：李提摩太和他的事業》，載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77頁。[LI Xiantang, "Timothy Richard and His Career in China," In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rans. LI Xiantang, HOU Linl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377.]

^② 李憲堂，《鐸巡中華：李提摩太和他的事業》，第380頁。

契合。其次，譯者的翻譯行為總會不可避免地打上譯者所處歷史語境的烙印。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氏對良臣丘處機與明君忽必烈的闡釋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他的人生際遇。譯者在華時間長達45年之久，在努力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他借《萬國公報》大力向中國推行各種新知，並就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提出具體改革方案。然而，“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其變革中國的雄心壯志成為泡影。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李氏筆下的丘處機不僅受到忽必烈的重用，而且將不朽作品《西遊記》獻給忽必烈之後，和平與文明取代了野蠻的殺戮政策。可以說，丘處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李氏夢想成為的政治人物。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Richard, Timothy.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London: T. & T. Clark, 1910.

_____.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3.

_____.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_____.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1916.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5.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Cohen, Paul A.. *Zai chuan tong yu xian dai xing zhi jian: Wang Tao yu wan qing gai g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Translated by LEI Yi, LUO Jianqiu.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FENG Ziyou. *Ge ming yi shi* (The First Collection on the Unofficial History about Revolution).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1.]

胡淳艷：《〈西遊記〉傳播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HU Chunyan. *Xiyouji chuan bo yan jiu* (A Study on the Transmission of Xiyouji). Beijing: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3.]

黎子鵬：《翻譯佛教——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基督教詮釋》，顧靜琴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2015年第1期，第55-78頁。[LAI Tsz Pang John. "Translating Buddhism: Timothy Richard's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ingqin to the West." Translated by GU jingq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1(2015):55-78.]

李暉：《“永生”的寓喻敘事：淺析李提摩太〈西遊記〉的翻譯理解方案》，載《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年第8期，第28-35頁。[LI Hui, "An Allegory of Christian Immortality : Timothy Richard's Scheme of Understand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8(2013):28-35.]

- 李憲堂：《鐸巡中華：李提摩太和他的事業》，載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LI Xiantang. “Timothy Richard and His Career in China.” In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ranslated by LI Xiantang, HOU Linl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劉珍珍：《〈西遊記〉節譯本的敘事建構策略研究》，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31-36頁。[LIU Zhenzhen. “O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e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2017):31-36.]
- 羅琤：《出使天國——以傳教士李提摩太英譯〈西遊記〉為中心的近代基督教本色化傳教策略研究》，載《佛學研究》，2016年第00期，第61-69頁。[LUO Zheng. “A Mission to Heaven: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Indigen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by Timothy Richard.” *Research of Buddhism*, no. 0(2016):61-69.]
- 魯珍晞：《中國教會大學史》，曾鉅生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Jessie Gregory Lutz. *Zhong guo jiao hui da xue shi*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Translated by ZENG Jusheng.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
- 蒲松齡：《聊齋志異》（全本新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PU Songling. *Liao zhai zhi yi*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SONG Lian. *Yuan shi* (A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6.]
- 魏源：《元史新編》，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WEI Yuan. *Yuan shi xin bian* (A Newly Organized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2.]
- 吳承恩：《西遊記》（世德堂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WU Cheng-en. *Xiyouji* (Shi Detang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ress, 2016.]
- 吳承恩：西遊記（西遊證道書），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WU Cheng-en. *Xiyouji* (A Taoist Interpretation of Xiyouj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 吳曉芳：《圖文互證：李提摩太〈西遊記〉英譯本的底本考論》，載《編譯叢刊》，2019年第2期，第1-44頁。[WU Xiaofang.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Illustration and Text: On the Source Text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no. 2(2019):1-44.]

于懷瑾：《從〈西遊記〉的翻譯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載《烟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62-70頁。[YU Huaijin. "From Xi You Ji to A Mission to Heaven: A Review on Timothy Richard's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14):62-70.]

中國基督教協會：《聖經》，上海：中國基督教協會，2009年。[China Christian Council. *Sheng jing* (The Holy Bible).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Press, 2009.]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ZHU Qianzhi. *Zhongguo jing jiao* (Nestorianism in China).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8.]

朱一玄、劉毓忱：《〈西遊記〉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ZHU Yixuan, LIU Yuchen. *Xiyouji zi liao hui bian* (A Reference Collection of Xiyouji).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